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18年 第5期

# 日本为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以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例

宋 伟

**内容提要** 日本型现实主义试图结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可以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提供建议,却无法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提供帮助。原因在于,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过于关注外交政策,没有区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不同,以及排斥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成熟,国际关系大理论创新的空间日益缩小,日本学界如果想要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上做出系统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理解、接受和合理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地区研究 系统性创新 日本型现实主义 社会科学方法论

有没有国际政治研究的日本学派? 由于语言条件的限制,本文并不能对此下最终结论。但是,至少从四卷本的《日本国际政治学》来看,初步回答是否

---

\*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2)





定的。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日本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侧重理论、历史和地区研究三个领域,对它们的研究共同支撑起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科。但对一个学科来说,除专业研究人员外,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针对本学科领域的专门理论和专门方法。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长于历史和区域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无所谓“日本国际政治学”,而是基于现有国际政治学理论及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国际政治研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引进西学非常早、科学技术发达、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以及战后崛起非常快的国家,日本为什么没有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研究的“日本学派”,也没有出现重大的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本文并不试图也无力对此问题做一个基于调查问卷的回答。或许有一个十分简单且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即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已经非常充分,并不需要、也很难出现重大理论创新。理论是必须的,“只有当国际关系进行科学探讨的时候,它才可能提供某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基于消息灵通的见解”。<sup>①</sup> 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完全可以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研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仍然在致力于中层理论及外交政策理论的创新,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创新方面一直表现平庸,因此,需要探究其原因。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认为日本缺乏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指的是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做某种系统性的发展,如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而不是说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完全没有理论上的创新。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创新方面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来说也具有启发意义。

## 一、“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何算不上理论创新

笔者认为,日本国际关系学界特别值得一提的理论创建是所谓的“日本型

---

<sup>①</sup> Jeffry A. Frieden and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 i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600, July 2005, p. 151.



现实主义”。既然是“日本型现实主义”，自然是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相对照而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及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强调人性、实力与物质利益的作用，认为国家利益的范围和重点需要依据国家自身的实力来确定；实力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因而现实主义被称为“实力政治”(Power Politics)理论。传统现实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有着清晰因果逻辑的科学理论，而是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和基本范式。正如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曾经指出的，“现实主义者承认一些一般性的假设，例如，国家是关键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实力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sup>①</sup> 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人性由于无法实证需要被放弃，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战争不断发生的根源，而国家间的实力分配则能够对无政府状态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结构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范式假定进行了扬弃，并且提出国际结构这一核心概念和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因果逻辑，从而使得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

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层次，而对体系层次的结构现实主义缺乏深入研究。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林田晃嗣指出，“无论是学术界的现实主义还是言论界的‘现实主义’，都存在着由日本国力和日本外交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侧面。比如对新现实主义介绍较晚，对其理解也不充分，这与日本外交缺乏对国际体系层次的关心有很大关系”。<sup>②</sup>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家，日本外交长期想要摆脱其战败国身份，以及谋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而不是寻求做世界大国，因此，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没有太多关注宏观的国际体系是很自然的事。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过于重视历史和区域研究有关。大多数日本学者喜欢“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学者没有认识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演变。例如，日本青

---

① Stephen M.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Dec., 1997, p. 932.

② 〔日〕林田晃嗣：《现实主义：日本的特点》，载〔日〕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页。





山学院大学教授土山实男引用阿诺德·沃尔弗斯的看法,将现实主义分为“悲剧学派”和“邪恶学派”。前者是聚焦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后者是关注人性。土山认为,“现实主义并不能保证在任何时代都是‘现实’的。这是因为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念型的思想,当然不可能洞察国际政治的所有方面,就如同现实主义的绘画并不是照片,只关注某些特定的方面”。<sup>①</sup> 土山实男认识到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模型,也认识到现实主义在将来可能过时(例如有一天如果跨国公司的力量超越国家)。但是,日本现实主义学者所致力于创建的“日本型现实主义”实际上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阶段,即试图弥合所谓的利益与道德、实力与价值之间的对立。这可能是因为战后日本国内存在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因此,保守派支持现实主义的实质政治取向,但同时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现实追随主义”。已故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在1952年发表了《“现实主义”的陷阱》一文,批判“保守派”的“现实主义”。他列举了“现实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简单地向既成事实屈服、只强调现实的一个侧面、追随(政治)权力选择的方向。<sup>②</sup>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国内环境下,现实主义被简单地等同于“马基雅维利主义”。

为了应对左翼和平主义者的批评,诸如高坂正尧这样的日本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所谓的“日本型现实主义”,其核心观点是,“如果不考虑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这一问题,现实主义恐怕就会陷入现实追随主义或犬儒主义。只有把价值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考量,(我们)才有可能追求从长远来看更符合现实国家利益的政策”。<sup>③</sup> 在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过于考虑现实、强调实力和利益的缺点的同时,高坂正尧强调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过于强调道德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缺乏对如今依旧支配着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的理解。没有权力支撑的理想不过是幻影,这在今日也是不变的事实。如果不充分理解权力政治,我们倡导的理想就会成为没有实体的‘空中楼阁’”。<sup>④</sup> 从这个角度出发,高坂正尧非常反感当时日本舆论界的意识形态

① [日]林田晃嗣:《现实主义:日本的特点》,第39页。

② 张帆:《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日本学刊》2018年第2期,第143页。

③ 同上,第147页。

④ 同上,第148—149页。



双重标准,即涉及美国的就批评、涉及苏联的就肯定。高坂回忆说:“我投身安全保障论争的最基本原因是对所谓双重标准的近似愤怒的感情……针对同一件事,(进步派)批评美国,却不批评苏联。”<sup>①</sup>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说,同时兼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现实主义者主张的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多做好事”,很难想象一个损人利己的国家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问题在于,想要从范式的角度调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恐怕是不行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两种理论范式本来就是强调现实世界的不同侧面。如果要把利益和道德、实力和价值统一在一个新的“日本型现实主义”理论之中,那么,就必须说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如果仍然认为实力和利益更为重要,而道德和价值只是工具,那就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认为两者同等重要,那么,“日本型现实主义”就不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糅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

这么做的问题在于,理论描述力增强了,但解释力下降了,因为我们本质上不了解到底是哪一种因素导致了需要解释的结果。用美国政治学者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的话来说,“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当描述性要求和解释性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即使这是以牺牲某些描述上的准确为代价的”。<sup>②</sup>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按照这种折中主义的做法,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出来具有清晰因果逻辑的理论。“可以肯定地说,理论的使命就是简化,而且在简化时,第一步是舍弃政治行为大量直观和经验的特征。用一种同样复杂的理论研究复杂事物,往往只会导致失败,而不会有助于理解。”<sup>③</sup>

事实上,从高坂正尧对于国家实力的看法也可以看出其折中主义思路。高坂认为,国家实力的来源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在他1964年发表的论文中,高坂把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及支配舆论的能力都视为实力的构成因素。在“日本型现实主义”看来,虽然军事力量仍旧不可或缺,但大国间权力

① 张帆:《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第147页。

②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1, Oct., 1961, p. 79.

③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





斗争的焦点已开始转向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sup>①</sup> 高坂等学者确实看到现代国际体系竞争方式的一些深刻变革,这与罗伯特·吉尔平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观察是一致的,“经济因素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区别现代国际关系和此前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sup>②</sup> 这种看法算不上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挑战。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军事力量更为重要,但一直强调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军事、经济、政府动员能力等都是包括在其中的。高坂正尧强调经济实力和外交,主要目标还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日本外交。因此,高坂十分认可“吉田主义”,认为吉田秉持“商人式国际政治观”,坚持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道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的根本愿望,“国民中的多数人为维持日常生活而努力,创造了他们的战后(生活)。并且,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使他们发现,战前的梦想是多么滑稽。对于日本的未来,他们寻求经济复兴和贸易”。<sup>③</sup> 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外交战略选择无疑是理性的、带有自己特色的,但这还称不上理论的创新。

类似地,“日本型现实主义”试图在势力均衡和国际制度等因素中寻求平衡。在另一位日本现实主义学者永井阳之助看来,均势“这种方式限制了国际冲突的烈度(肯定有限战争)、凭借经验试错的积累来创造规则(临时协定),把秩序的动态维持放在第一位。相比完全裁军与法律机构的设置,将道德与权力结合起来的外交与政治智慧是维护和平最必要的保障”。<sup>④</sup> 新一代“现实主义者”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各国维护自身的理念与利益,通过行动创立国际法,提高联合国的权威”,渐进地实现和平。<sup>⑤</sup> 因此,所谓的“日本型现实主义”,一方面,坚持实力政治为主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国内政治实践的现实情况,提倡价值理念的辅助作用,其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最大限度整合国内意见、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对外决策取向。<sup>⑥</sup> 但是,在这样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型现实主义”越来越偏离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

① 张帆:《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第149—150页。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③ 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9页。

④ 张帆:《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151页。

⑥ 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第178页。





将其演变成为一种复杂的外交政策学说,不太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具有明确因果逻辑的科学理论。由于过分注重为国家外交服务,在日本国际关系学界,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始终没有得到广泛的接纳,导致“日本型现实主义”一直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哲学思考层次。

## 二、日本为何缺乏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除“日本型现实主义”外,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在历史和区域研究方面并不缺乏深刻的思想和理论总结。日本学者使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并试图批评或者改进这些理论。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即使人们想从大脑中摒弃理论,这也会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某些暗含假设、命题——虽然它们只是理论的粗陋替代品——的帮助,人们根本无法处理世界政治的复杂现实”。<sup>①</sup>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还缺乏让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管是在宏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层面还是在中层或者外交政策理论的层次。对“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分析已经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些根源。日本虽然是一个战后快速崛起的大国,其国内学界所关注的重点一直是日本的外交政策,这也对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产生了消极作用。除此之外,考察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理论的标准、理论效用的争论、对于理论自身的认知,可以从中发现理论创新不足的一些主要原因。

### (一) 国际关系理论已经相当成熟,留给日本学术界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空间并不多

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似乎可以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进程。原因在于,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国际政治规律是有限的,但解释可以是无限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指出,“事实不能决定理论,而对于一组事实则可能有多个理论适用。理论无法确定无疑地解释事实,我们也无

---

<sup>①</sup> Robert Keohane,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





法保证一个好的理论有朝一日不会被另一个更好的理论所代替”。<sup>①</sup>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规律是有限的,而人类所能提出的有意义的理论解释同样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已经提炼出国际体系层次的各种主要因素——实力结构、国际制度、集体认同。这三个变量涉及人们观察世界的三个维度:重度物质主义、中度物质主义和轻度物质主义。它们都属于科学实证主义的范畴。如果再往前走,就可能进入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领域。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已经具备了范式、硬核和推论,属于系统性的研究纲领。想要对它们的基本假设做出改进不是不可能,但已经相当困难。

日本学者饭田敬辅有关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饭田认为,“正如现实主义所言,笔者也认为自由主义制度论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权力的视角。政治学是通过非市场机制进行价值分配的理论,最为关心的是决定分配比率的权力。因此,制度论也必须明确制度与权力形成何种关系”。“基于制度的权力在构建之初与本源性权力相互关联。但是制度如果是硬性的,那么,制度性权力与本源性权力的偏差将随着时间而增大。同时,制度为了有利于本源性权力的持续,也具有延缓产生偏差的效果。”<sup>②</sup>事实上,这讲的就是国际制度和实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霸权国的衰落,国际制度的权力分配与现有的实力分配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但是,这种权力分配由于有利于旧的霸权国,因此实际上是减缓而不是加速这种差距的扩大。这一理论结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事实上罗伯特·吉尔平这样的学者已经做了很充分的论述。

因此,想要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范式的角度实现创新,确实已经没有了多少空间,更可行的路径是范式内创新,例如围绕着结盟、核威慑等展开的中层理论的创新。这一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成熟后,日本国际关系理论缺乏系统性理论创新的原因——观察国际体系的基本维度已经被穷尽,但并不能说明日本国际关系学界为何一直没有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也不能说明日本国际政治研究在中层理论方面仍然缺乏创新的原因。

①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 [日]饭田敬辅:《新自由主义制度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功能性与局限性》,载[日]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第59、61页。





## (二)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过于关注其外交政策需要,而从国家层次出发是不太可能实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

国际关系不等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的是国家间的互动模式及其结果,而外交政策理论解释的是(应该)如何制定某种外交政策。这并不是说,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用来解释外交政策,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都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行为模式的假设。但是,外交决策毕竟是一个国内过程,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常常使其偏离国际体系的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因此往往不能充分解释日本的外交,从而遭到日本学者的批判,但是过分关注日本外交只能产生有日本特色的外交政策理论,而不能产生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国际关系研究者普遍把国际关系理论混同于外交政策理论,所以才提出要折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以期更好地为外交政策服务。殊不知,国际关系理论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为外交政策提供指导,而是解释国际体系内的各种规律,例如均势为什么会“自然生成”。以关宽治和坂本义和对均势理论的批判为例,他们都是把均势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来对待的。关宽治认为均势是“主观的”,因此美国和苏联对现状的看法不同,在追求均势的过程中导致军备竞赛的不断延续。因此,他认为均势无助于和平。<sup>①</sup>而坂本义则认为,均势需要一个平衡者,而美苏的高度对立导致均势运作不再存在。<sup>②</sup>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即没有把均势看作是一种大国实力相对平衡的状态,而是强调 19 世纪均势外交中联盟灵活调整、英国作为平衡者的作用。结构现实主义意识到国家间的相互模仿和学习会导致均势,以及美苏两极均势体系相对于 19 世纪需要一个平衡者的多极均势体系所具有的优势。

## (三) 日本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历史方法和地区研究占绝对优势,比较排斥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些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不理解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这自然给理论构建

<sup>①</sup> [日]巢山靖司:《日本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述评》,赵毅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9 年第 7 期,第 33 页。

<sup>②</sup> [日]巢山靖司:《日本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述评》,第 33—34 页。





增添了种种障碍。相比传统的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是要构建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化模型,论证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话来说,“好的理论是简洁的。它只用很少的、简洁排列的变量来解释这些变量的作用”。<sup>①</sup> 阎学通教授指出,“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这种方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sup>②</sup> 要接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从此出发来建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外交政策理论,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宫冈勳认识到,“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具有以地区研究、国际政治史及外交史研究为专业领域的学者比例极高的特点。在日本,从事这些研究的研究者中间,比起科学方法,传统(历史、法)方法处于支配地位。”<sup>③</sup> 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超越“分居”》一文中指出两个方法论研究者之间的对立:“对于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外交史研究者而言,很难想象存在外交文献之外的‘实证研究’的素材。……将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以模型的形式抽象化,用历史事实记述其模型的动态,很多研究者都对这种方法存在违和感。从他们的角度看,没有运用实际的史料怎么能形成国际政治理论?”“另一方面,有的批评者认为,地区研究本身是由多种研究者形成的学术领域,确定其内在内容极为困难,但如果沉湎于非常狭小范围的‘自耕田’中的分析,那么只在‘自耕田’中进行的地区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有何关系?即使不是这种‘自我陶醉型’的地区研究,其大多是否也只不过是介绍外国的情况?或者只是基于研究某一地区的研究者的视角进行的特殊性研究的积累?”<sup>④</sup>

宫冈勳尖锐地批评了日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他指出,“即便是最近更为学

①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7页。

③ [日]宫冈勳:《建构主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日]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第85页。

④ [日]田中明彦:《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超越“分居”》,载[日]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第14—15页。

术性的建构主义研究,其很多在方法论的研究上也并不充分。比如,可以发现有些研究在从国家行为变化推到身份认同变化的同时,却尝试用这种身份认同解释相同的国家行为,从而陷入了恒真命题的陷阱”。<sup>①</sup>日本学者在构建理论时缺乏社会科学方法论自觉的例子有很多。例如,马场伸也认为,“生活在实现了现代化的世界中的人们,在追索着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最终未必只限于国家的范围,也可以是特定的集团、民族、地域、超国家组织,或者是普遍的地球社会。”<sup>②</sup>马场伸也的看法本质上混杂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国际社会学”,并不是解释性的理论。另外一个例子是猪口孝认为“雁型模式”是一种有日本特色的中层理论,但这一产业转移模式的概括并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相反,它是需要被解释的对象。<sup>③</sup>

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的“国际文化论”是值得一提的理论努力。他认为,个人在不同层级的场域会镶嵌着不同的身份认同,文化交流只需让作为文化搬运者的“个人”自由移动而催生“文化触变”。<sup>④</sup>“国际移动”必将伴随着文化要素的移动,而“人”是国际移动的主角,通过“人”持续跨国界交流,理论上而言最终应该会创造一种“地球文化”。<sup>⑤</sup>平野勾勒出以个人的国际移动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蓝图,当人们自发地于东亚范围内跨境移动时,将会助长他们对东亚的认同程度,无形之中自然成就东亚共同体的事实,这现象就好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原始意义。<sup>⑥</sup>平野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入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范畴,但问题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即丰富和发展社会建构主义对于集体认同如何形成的研究。只有人的自由交流并不一定会产生集体认同,更不一定会产生积极的集体认同,相反,交流也可能带来摩擦和敌对。以个人取代国家,或许是平野对于建构主义的发展,但问

① [日]宫冈勳:《建构主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78页。

② [日]大芝亮:《无国境的国际政治》,载[日]大芝亮、古城佳子、石田淳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二卷):无国境的国际政治》,张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③ Takashi Inoguchi, “Why Are There No Non-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Japan,” in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51.

④ 苏翊豪、石之瑜:《平野健一郎的国际文化论:兼评国际关系日本学派的文化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128页。

⑤ 同上书,第127页。

⑥ 同上书,第129页。



题在于,个人之间的交流未必能带来地区内国家间认同的变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让理论具备严密的逻辑和结构。缺乏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素养,很难想象可以发展出高水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

## 结 论

本文初步分析了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没有系统性理论创新的问题。应该说,现有的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日本国内学术界过于关注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及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问题、研究领域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了解和自觉,是导致一直以来没有出现系统性创新的主要原因。在所存在的三个问题中,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克服的,但第一个问题恐怕是所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面临的共同难题,即范式创新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性,除非世界政治短期内出现某种质变。试图从国家特殊性的角度来构建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例如,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御巫由美子认为,“性别的状态也各个文化所固有的。因此,欧美中的性别与非欧美社会中的性别尽管存在共同点,却不可能完全一致,必须另行探讨非欧美文化圈中的性别状态”。<sup>①</sup>但是,这种基于对日本性别状态特殊性的探讨,不太可能产生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性别国际关系理论。当然,基于日本的特殊性,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有日本特色的外交政策理论?但即便如此,如果这种外交政策只能解释日本,那其理论意义必然大打折扣。但是,跳出对日本外交的执着及对特殊性理论的关注,日本学者有可能在接纳社会科学方法后,基于极其出色的历史和区域研究,有可能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层理论及外交政策理论。

---

<sup>①</sup> [日]御巫由美子:《性别:女性主义国际关系论的发展与课题》,载[日]田中明彦、中西宽、饭田敬辅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一卷):作为学科的国际政治》,第117页。

